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4.020

有生量词的方言分布及类型特征研究

伍莹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通过考察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使用情况发现,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汉语方言量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使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少数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的植物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都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系统应该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量词类型。

关键词:有生量词;方言分布;类型特征

中图分类号:H1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4-0155-09

以往学界通常从两个角度对有生量词进行研究:一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汉语中有生量词的历史演变,如叶桂彬分别考察了汉语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的历时演变^{①②};王彤伟探索了量词“头”的历史演变^③;张赫探讨了汉语生物属性量词的发展演变^④。二是从共时的角度分析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有生量词的语义类型,如樊中元分别研究了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人或动物量词的语义类型^{⑤⑥}。但鲜有学者从汉语跨方言的角度考察有生量词的使用和分布情况。本文将突破以上研究局限,将汉语各大方言纳入考察的范围,全面分析汉语方言有生量词的分布状况、使用特点及类型特征。

本文使用的语料均来自公开发表的方言研究文献、方言词典以及对湖南省某高校各方言区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⑦。本文共调查了32个

方言点,覆盖各大方言区。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在图表中只呈现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点。

一 量人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汉语方言量人量词比较丰富,主要有“个、只、位、口、头、条、块、枚、粒、根、枝(支)、碌、莨”等,下面分别介绍这些量词的方言分布状况、量词的性质及其使用特点。

个:分布最广,遍布官话、晋语、徽语、吴语、赣语、湘语、粤语、闽语、客家话、平话等各大方言。

只:遍布各大南方方言,如吴语、湘语、赣语、粤语、客家话、闽语、平话等。

位:主要分布于官话区(如洛阳、西安、南京、武汉、成都等)、吴语(如上海、崇明、苏州等)、赣语(如黎川)及北部湘语(如长沙)等。

口:主要分布于官话区(西安、柳州、银川、乌

收稿日期:2023-04-1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XSP18YBC269);湖南省语言资源研究基地资助

作者简介:伍莹(1978—),女,湖南祁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词汇语义学研究。

①叶桂彬:《量词“头”的历史考察及其他称量动物的量词》,《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4期。

②叶桂彬:《汉语中量“人”量词的历时考察》,《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6期。

③王彤伟:《量词“头”源流浅探》,《语言科学》2005年第3期。

④张赫:《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8—93页。

⑤樊中元:《动物量词的语义类型学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⑥樊中元,谢小明:《称人量词语义特征的跨语言考察》,《民族语文》2017年第1期。

⑦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献,文中都标明了出处,部分未标明出处的语料来自笔者的调查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李荣主编:《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鲁木齐等)、晋语区(山西太原、山西岚县^①)以及海南闽语区(如海南府城、文城、万城)^②。

头:主要分布于湘桂粤交界的土话区(如广西贺州^③;湖南新田^④、蓝山^⑤、嘉禾^⑥)。

条:主要分布于湖南湘西方言区(如湖南吉首、凤凰^⑦、溆浦^⑧、泸溪^⑨、辰溪^⑩、沅陵^⑪)以及粤语(如广州^⑫)。

筒:主要分布于湖南湘西方言区(如湖南吉首、凤凰^⑬、保靖^⑭)。

块: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区(如四川乐山^⑮、彭州^⑯、大邑^⑰)、冀鲁官话(如山东淄博^⑱、即墨^⑲)以及晋语(如山西太原、晋源^⑳、岚县、河南焦作^㉑)。

枚:主要分布于闽语区(如海南海口,海南府城、文昌^㉒、琼海^㉓、广东雷州^㉔)以及徽语区(如江西浮梁^㉕)。

支、碌、莧: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州^㉖)。

粒: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州)以及湘南土话区(如湖南道县^㉗)。

根:主要分布于云南的西南官话(如云南蒙自、建水^㉘)。

综观汉语方言量人量词发现,汉语方言通常没有专门称量“人”的量词,大多用通用量词称量人,其中用得最广泛的是通用量词“个”,在北方

方言中“人”几乎都是用通用量词“个”称量。在南方方言中,称量“人”既可以用“个”,也可以用通用量词“只”,因为“只”是南方方言的通用量词,如吴语、湘语、赣语、粤语等。“个、只”称量“人”都可以表示中性色彩,无喜爱、憎恨的感情色彩,也无身份地位的高低,如湘语称量“老师、学生、军官、医生、律师”等,“个、只”都可以使用。但如果在表示贬义色彩的语境中出现,不能用“个”,必须用“只”,如“一只贼、一只强盗、一只土匪、一只流氓”等。可见,通用量词“个”称量人占有绝对优势,不仅北方方言使用,南方方言也使用。通用量词“只”称量人只在南方方言中使用,可以表示贬义色彩。张赫指出,“汉语中指人名词使用最多的量词是不标示任何特征、不带任何特殊意义的通用量词“个”,不特别标示指人名词是汉语分类词系统与其他语言分类词系统最大的不同。”^㉙

方言中,称量人的其他量词如“条、筒、块、粒、根、枚”等通常是形状量词,一般用来称量无生物,但是这些称量“人”的形状量词都是该方言的通用量词,如湖南湘西的“条”“筒”、四川话和山西话的“块”、湘南土话中的“粒”、海南闽语“枚”等,这些形状量词在该方言中不仅能称量无生物,还可以称量有生物和抽象物。用“头”称量“人”的方言,虽然“头”没有完全通用化,但在动物中是通用量词,如广西贺州^㉚、湖南^㉛、蓝

①沈明:《山西岚县方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8页。

②符其武:《琼北闽语词汇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

③陈才佳:《贺州市桂岭本地话动物类通用量词“头”》,《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④罗听如:《湘南土话词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122页。

⑤张燕:《湘西方言中泛用量词“条、筒”初探》,《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

⑥贺凯林:《溆浦方言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⑦龙仕平:《芦溪方言“条”与普通话“条”之比较》,《汉字文化》2016年第3期。

⑧周红叶:《浅析湖南辰溪方言的通用量词“条”》,《安徽文学》2018年第4期。

⑨杨蔚:《沅陵乡话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⑩单韵鸣:《广州话量词“条”的语体色彩再酌》,《中国语文》2005年第9期。

⑪赖先刚:《乐山方言》,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65页。

⑫杨绍林:《彭州方言研究》,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⑬黄伶俐:《四川大邑新场古镇方言通用量词“块”研究》,《南腔北调》2011年第1期。

⑭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01页。

⑮王文卿:《晋源方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⑯司罗红,李肖肖:《焦作方言中的特殊量词用法》,《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⑰王连清:《海南方言的通用量词“枚”》,载刘丹青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新视角——第五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339页。

⑱方清明:《浮梁话与普通话量词比较研究》,《景德镇高专学报》2005年第1期。

⑲黎纬杰:《广州话量词举例》,《方言》1988年第1期。

⑳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版。

㉑张赫:《类型学视野的汉语名量词演变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山_{太平圩}、嘉禾_{塘村}等,这些方言中的“头”可以称量任何动物,如“猪、牛、羊、狗、鸡、蚂蚁、鱼、蝴蝶”等,在动物中是通用量词。因此,这些形状量词不能看作能称量“人”的专用量词,只能看成是通用量词,和通用量词“个、只”称量“人”的性质一样。

在这些用形状量词称量“人”的方言中,粤语称量“人”的量词比较特殊。粤语称量“人”除了用通用量词“个、只”以外,还可以用形状量词“条、碌、支、粒、菟”等,但是这些量词都是用来称量无生物的专用量词,并不是粤语的通用量词。虽然这些形状量词都可以称“人”,但都有各自不同的感情色彩。单韵鸣认为,粤语“条”一般在非正式场合中用来称量人,既可以表示贬义的感情色彩,也可以表示关系友好、语气和善亲昵等感情色彩^①。黎纬杰指出,粤语中称量“人”一般用“个”,不含有任何感情色彩;“只”称量人有贬义,“碌”本来用于“圆柱形而较粗”的事物,用来称量人往往带有轻蔑、厌恶的色彩;用“粒”称量人往往含有轻蔑之义;用“支”称量人也还有轻蔑或俏皮之义^②。陈祝琴认为,“菟”称量人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表示不尊重、不礼貌^③。由此可见,粤语用这些形状量词称量人,表达的感情非常细致,在

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情感状态下,可以选择不同的形状量词,但用这些形状量词称量“人”都表示贬义色彩,这可能因为这些形状量词本来就是用来称量无生物的,用来称量人,将“人”比作无生物,于是就产生了贬义。而其他方言中称量人的形状量词“条、块、粒、枚”等是该方言的通用量词就没有贬义。

综上所述,汉语通常没有设定专门的量词量人,一般用通用量词量人,或者用形状量词量人,即使设定了几个专门的量词量人(普通话:位、名、员;方言:位),也受语体色彩和特定语境的限制很大,使用频率低,不具有普遍性。

二 动物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汉语方言称量“动物”的量词复杂多样,各方言的使用也有差异。为了尽可能获得真实、可靠的方言语料,以便较深入地考察汉语方言的动物量词,本文采用了文献参考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收集语料。因为动物较多,为了分析方便,本文挑选出 12 种既常见又有代表性的动物作为调查对象,考察各方言动物量词的使用情况。动物量词的方言分布如表 1。

表 1 称量“动物”量词的方言分布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黑龙江哈尔滨	条	条	条 只	头 只	口 只	头 只	匹	条 只	只	只	只 个	只 个
新疆乌鲁木齐	条	条	条	头 只	头 只	只	匹	只	只	个	只	只
陕西西安	条 个	条 个	个	头 个	头 个	个	匹 个	条 个	个	个	个	个
甘肃兰州 ^④	个	个	个 只	个	个	个 只	个 匹	个	个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官话 山东牟平	根	根	根	头	头 口	头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山东青岛	条 个	条 个	个	头 个	头 个	只 个	匹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个	只 个
河南洛阳	条	条	条	头	口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只
辽宁大连	条	条 个	条	头	头	头 只	匹	只	只	个	个	个
江苏南京	条	条	条 只	头 只	头 只	头 只	匹 只	条 只	只	个 只	个	个

①单韵鸣:《广州话量词“条”的语体色彩再酌》,《中国语文》2005年第6期。

②黎纬杰:《广州话量词举例》,《方言》1988年第1期。

③陈祝琴,岳秀文:《汉语方言量词“兜”的来源与形成》,《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九辑)》2017年版,第291页。

④张淑敏:《兰州话量词的用法》,《中国语文》1997年第2期。

续表 1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四川成都	根条	根	根	根条	根口	根只	匹	根	只	只	只	只
官话 湖北武汉	条	条	条	匹条	匹头	匹	匹	匹	只	只	只	只
贵州贵阳	条	条	条	条	头口	只	匹	头条	只	只	只	只
晋语 山西太原	根	根	根只	头块	头块	头只	匹块	根个	只个	只	只个	只个
山西古交①	条	条	条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个	个	个
山西晋源②	根			个	个		个		只	只		
上海	条	条	条	条只	只个	只	匹	只个	只个	只	只	只
吴语 浙江宁波③	根④	根	根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浙江余杭	根	根	根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苏苏州	条	条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浙江温州⑤	头条	头	头	头	头	头	头匹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头个
浙江丽水	尾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徽语 安徽绩溪	只条			只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安徽歙县⑥	个条			头	头	只	只	只	只			
安徽绩歙片⑦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赣语 江西南昌	条只	条	条只	条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西黎川⑧	条	条	条只	条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江西萍乡	只			只	只口	只	只匹	只	只			
江西抚州⑨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①武慧霞:《试论山西古交量词的用法》,《北方文学(下旬)》2014年第4期。

②王文卿:《晋源方言研究》,语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197页。

③阮桂君:《宁波方言物量词研究》,刘丹青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新视角——第五届汉语方言语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339—349页。

④吴语中称量“鱼”的量词各地发音相似,都是读成[kua³³]/[kuəŋ⁵⁵],但写法各不相同,有“根、梗、光、觥”等。参见阮咏梅(2013)认为称量“鱼”的量词[kua³³]本字就是“根”,因为两者在温岭方言中读音相同。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将吴语各地称量“鱼”的量词“梗、光、觥”都写成了“根”。参见阮咏梅:《温岭方言中的量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⑤王彬思:《温州方言名量词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⑥陈丽:《安徽歙县大谷运方言》,方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146页。

⑦孟庆惠:《徽州方言》,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102页。

⑧颜森:《黎川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166页。

⑨付欣晴:《抚州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8—191页。

续表 1

动物	鱼	蛇	毛虫	牛	猪	羊	马	狗	鸡	虾	苍蝇	蚊子
湘语	湖南长沙	条	条	只	头	只	只	只匹	条只	只	只	只
	湖南宁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湖南邵阳	条只	条	条只	条只	只	只	只	条只	只	只	只
	湖南娄底	条只	条	条	只	只	只	匹	条只	只	只	只
	湖南双峰	条	条	条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湘桂粤土话	广西贺州①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湖南新田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湖南江永②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匹	头	头	头	头
闽语	福建福州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福清③	尾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龙岩④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头
	福建泉州	尾	尾	尾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福建漳州	尾只	尾只	尾只	头只	只	只	只	条只	只	尾	只
	福建厦门	尾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海南海口	条只	条只	条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福建邵武⑤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茎			
客家话	广东梅县⑥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广东河源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江西吉安 ^{遂川}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条	只	个	个
	江西于都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粤语	广东广州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广东东莞	条	条	条	头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平话	广西南宁	条	条	条	只	只	只	匹	只	只	只	只

从表 1 可以发现,汉语方言称量动物使用频率最高的量词是“只”,尤其是南方方言;其次是“个”,在北方方言里使用得多。除了通用量词“只、个”外,还有形状量词“条、根、茎”,准动物量词“头、口、尾、匹”等。“头、口、尾、匹”都称量动物,但不是类型学上所称的动物量词,类型学上的动物量词,指的是能称量所有动物的量词,而在大多数方言中这些量词只能称量特殊类型的动物,不能称量所有动物,因此,我们将它们称为“准动

物量词”。

1. 通用量词“只”“个”

近代汉语中,“只”是常见的动物量词,明清时期“只”称量的范围逐渐缩小,最后固定为称量形体较小的动物。在通用量词是“个”的北方方言中,通常动物都可以用“个”称量,如甘肃兰州、山东青岛、陕西西安等地方言。体型较小的动物如“鸡、虾、苍蝇、蚊子”等也用“只”称量。因此,在北方有些方言称量小型动物既可以用“只”,也

①陈才佳:《贺州市桂岭本地话动物类通用量词“头”》,《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185页。

③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2—214页。

④李焱:《浅析龙岩方言量词“头”》,《青年文学家》2009年第16期。

⑤严修鸿:《福建西部方言的量词“茎”字》,《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⑥温美姬:《客赣方言量词比较研究——以梅县话和南昌话为例》,《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可以用“个”,甚至在有些方言中“牛、猪”等大型动物也可以用“只”称量,如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地方言;“只”在南方方言中是通用量词,南方方言除了小型动物可以用“只”称量外,其他动物大多也可以用“只”称量,甚至在有些方言中,一维特别凸显的条形动物如“蛇、鱼”等都可以用“只”称量,如江西于都、抚州等地赣语,福建漳州、海南海口等地闽语。南方方言用“个”称量动物的很少,通常出现在与官话相邻的方言区。

2. 形状量词“条、根、茎”

称量动物的量词一般采用“部分代替整体”的转喻方式由“身体部件”名词语法化而成。能充当量词的“身体部件”必须在其整个身体中具有凸显性并且人们对它有较高的关注度。不同动物凸显的身体部件不同,同一动物不同方言区人们关注的部位也不同。“身躯”“头部”“嘴部”和“尾部”都是动物最易凸显的身体部件。

有些动物长条形的“身躯”最为凸显,或者有些方言区更关注的是动物的长条形身躯,因此,通常用“条/根”称量。整个身体呈一维长条状的动物,如“蛇、毛虫、鱼”等,绝大多数的方言用形状量词“条/根”计量,用“根”计量的方言相对较少,如宁波、成都话、牟平等地方言。三维立体的动物,如“牛、狗”的长条形身躯特别容易凸显,因此,许多方言“牛、狗”用“条/根”称量。有些方言关注所有大型动物的身躯,如“牛、猪、羊、马、狗”等,这些动物都可以用“条/根”称量,如广东梅县用“条”称量,四川成都用“根”称量。在方言中“条/根”语义泛化程度较高,在“硬度”这一语义特征上的对立相对模糊。闽西地区如福建邵武话的“茎”也是形状量词,几乎所有的条状物都可以用“茎”。量词“茎”是对古汉语的继承和发展,是一个古老的量词。

3. 准动物量词“头、口、尾、匹”

动物的头部是最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部分,每一个动物都有头,在认知上很容易被凸显出来。在汉语方言中,大部分官话区用“头”称量大型牲畜。而有些方言可以用“头”称量所用的动物,如闽语区福建福清、福州、莆田、建瓯、龙岩等地方言,紧靠福建的吴语如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方言以及湘桂粤交界的土话区如江永土话、广西贺州、广东乐昌等方言,其中广西贺州、湘南土话中的“头”还可以称量“人”。

动物的“口”是维持生命最重要的器官,也是容易凸显的身体部位。在汉语方言中动物只有“猪”用“口”称量,主要分布在官话区(河南洛阳、山东牟平、江苏南京、四川成都等)和晋语区(山西忻州、大同、岚县等)。“口”称量的对象有较大的语义限制,除了具有“有口”的条件,还要具有“需要供养”的条件。“口”量人时,只限于称量家庭成员,因为家庭成员既有口,又需要供养,是最适合用“口”称量的对象;“口”可以称量“猪”是因为自古以来“猪”都是“家”的象征。汉字“家”完美地诠释了古代文化中家和猪的亲密关系,“家”“从宀,从豕”,房屋里有猪才是“家”,因此,猪是构成一个家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先民的认知中,“猪”就如同需要“供养”的“有口”的家庭成员。因此,“口”称量“猪”和称量家庭成员一样被人们使用。

动物的“尾部”由于突出的形状和重要的功能而凸显,或者当地方言区人们更关注的是动物的“尾部”。量词“尾”主要分布在闽语区,常用来称量“鱼”,其次是“虾、蛇、毛虫”等。用“尾”称量的动物必须具有“尾部凸显”的特征,鱼的尾部不仅外形突出,而且对其有重要功能,“尾部”凸显是“鱼”最典型的特征,因此,鱼是“尾”的典型成员,能用“尾”称量动物的方言,“鱼”一定用“尾”称量。在厦门话中,“尾”只能计量“鱼”,而在泉州和漳州方言中,“尾”还可以计量虾、蛇、虫等“尾部”比较突出的动物。“鱼”在闽语中都用“尾”称量,这一用法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闽语方言区都靠海,捕鱼是当地人们主要的生活来源和经济来源,“鱼”对当地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人们专门设定了一个量词来称量“鱼”,以便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随着“一尾鱼”说法普遍性和常用性的提高,“尾”也开始称量其他“尾部”较凸显的常用动物“虾、蛇、毛虫”等。

“匹”是“马”的专用量词,在北方方言区“马”通常用“匹”称量。在古代北方地区,“马”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战争工具,由于其重要性,人们专门设定了一个特定的量词来计量,以便和其他的动物加以区分。而南方方言中的“马”通常用“只”或“头”计量,即使用“匹”计量,也是受到了官话的影响,如长沙、南宁、江永等地。但湖北的西南官话如武汉话、黄冈话却是例外,“匹”可以称量所有的大型动物,如

“牛、猪、羊、老虎、马”等,这是“匹”范畴进一步扩大的结果。

用“口”称量“猪”和南方闽语专用量词“尾”计量“鱼”以及北方方言专用量词“匹”计量“马”,都是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而形成的结果。Lakoff认为,分类是来自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类与其周围物质间环境的互动,而非单纯的依据个体的客观属性特征作分类,因此要广泛解释人类分类的行为,需要参照人类主观经验的因素,即文化生活经验。所以,无论传统分类或原型理论,其所考虑的个体特征大致属于客观的立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会因不同的文化对外在事物产生种种交互作用的丰富经验而有不同的认知,进而产生主观的意识,对物体作不同的分类^①。

综观汉语方言称量动物的量词发现,汉语方言中一般采用通用量词“只”和“个”称量动物,其次是形状量词“条、根”。准动物量词“头、口、尾、匹”在绝大多数方言中只能称量特殊类别的动物,而不是所有的动物,不是真正的动物量词,这些量词使用范围狭窄,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化含义,与功能量词的特点相似。但在极少数方言中(如闽语福州话、龙岩话,贺州桂岭土话)“头”能称量所有的动物,是真正的动物量词。

三 植物量词及其方言分布

植物主要包括“树、草、菜”三大类,汉语方言称量这些植物的量词也非常丰富,下面将介绍这

些量词的方言分布状况及使用特征。

棵:主要分布于官话区或靠近北部地区的南方方言:官话区(如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安、武汉等),晋语(如山西万荣、太原等),徽语(如安徽绩溪、歙县等),湘语(如湖南长沙),赣语(如湖北大冶^②、安徽宿松^③),吴语(如上海、苏州)

株:主要分布于吴语区(如浙江宁波、温州、舟山^④等)。

苑:主要分布于南方方言区(如湘语、赣语、客语、粤语、闽语、西南官话等)。

丛:主要分布于闽南语区(如福建泉州、漳州、厦门,广东汕头、揭阳,海南^⑤等)。

木^⑥:主要分布于粤语区(如广东广州、东莞,广西南宁^⑦、北海^⑧等)和晋语区(如山西太原、文水、平遥^⑨等)。

条:主要分布于客语区(如广东梅县,广西兴业、博白、容县^⑩等)。

根: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如湖北宜都^⑪,四川成都^⑫、彭州)、赣语(如湖南平江、岳阳^⑬,湖北咸宁^⑭)、徽语(祁德片、严州片)、勾漏粤语(如广西贺州^⑮)等方言区。

枝(支):主要分布于吴语区(如浙江海宁)和客语区(如福建永定)。

茎:主要分布于徽语区(如江西浮梁)和闽西区(如福建邵武、连城、上杭)。

头:主要分布于客语区(如广东梅州,广西陆

①Lakoff, G.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In C. Craig (Ed.), *Noun Class and Categorization*.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13-52.

②汪国胜:《大冶方言语法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③唐爱华:《宿松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④方松熹:《舟山方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⑤符其武:《琼北闽语词汇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页。

⑥称量植株的量词在粤语中读[po]、在晋语中[puoʔ],读音相似,但文献中的写法各有不同,有“坡、颇、朴、钵”等。李小萍(2013)根据读音和用法考证其本字当为“木”。我们认同这一看法,将称量植株的量词[po]全都统一写成“木”。参见李小萍:《山西方言北部、中部方言植株个体量词[puoʔ]考》,《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⑦林亦,覃风余:《广西南宁白话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⑧陈晓锦,陈滔:《广西北海市粤方言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⑨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37页。

⑩陈晓锦:《广西玉林市客家方言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8页。

⑪李崇兴:《湖北宜都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9页。

⑫张一舟等:《成都方言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83页。

⑬朱道明:《平江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页。

⑭王宏佳:《咸宁方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

⑮陈小燕:《多族群语言的接触与交融——贺州本地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川^①、江西定南^②、瑞金^③)和赣语区(如江西于都、黎川)以及闽西区(如福建龙岩)。

窝:主要分布于西南官话(如四川成都、西昌^④、自贡^⑤、重庆等)和粤语区(如广东四会、肇庆、云浮、广宁等^⑥)。

窠:主要分布于赣语区(如安徽宿松、湖北咸宁)。

综观以上植物量词的方言分布可以发现,称量“植物”的量词主要有“棵、株、莧、丛、条、根、茎、枝、木、本、头、窠、窝”等,除了“头、窠、窝”三个量词外,其他量词都是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名词,而且这些植物部件的名词很多都不同程度地发展成了形状量词,如“条、根、枝、丛、茎”已经发展为形状量词,“棵、莧、本”在一些方言中只能称量“植物”,而在另一些方言中可以称量条状事物,发展成为了形状量词,如贵阳话的“棵”可以称量“棍子、竹竿、扁担、绳子”等条状物;粤语的“莧”可以称量“鱼、蛇、木、柴、钥匙”等条状物;浙江金华_{岩下}“一本针”、福建仙游“一本锁”等用法。

“头”通常用来称量动物,在一些方言中还可以称量植物,因为动物有头有尾,植物也有莧有尾(即本末)。在湘方言中树的根可以称为“树莧脑”,即“脑”和“莧”意义一样,由此可见,树的“莧”等同于“头”,这样通过转喻机制,“头”也可以称量“植物”;而另一些方言“头”还可以称量“圆形物”,也发展成了形状量词,如在闽语建瓯话中“头”可以称量“蛋、花”等圆形物。“株、木”只能称量植物,没有进一步发展。“窠”和“窝”都指的是“鸟兽昆虫的巢穴”,通过隐喻机制,语义发展为种植植物的“圆坑”,对于生长的植物而言,只要有“根”就会有一个“窠/窝”,所以植物也可以用“窠/窝”称量。

Adams 考察了 37 种亚洲语言的量词系统指出,植物是基本隐喻的基础。在多数分类词语言中,如印度尼西亚语、老挝语,都用植物或植物部

件名词用作量词,其中,“树干、果实、叶子”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植物部件,它们分别对应事物“长、圆、扁”等三种基本的形状,这三种形状是数分类词结构中出现的最强的隐喻^⑦。Croft(1994)考察了各种量词系统指出,量词的语义分类中,自然物“树、花、果实、树枝、种子、叶子”等植物部件的名词常用作量词,并且可以称量其他无生物,表示形状^⑧。由此可见,汉语用植物或植物部件来称量植物并发展为形状量词,具有类型学共性。汉语表示树枝的名词“枝、条、茎、棵”,表示树根的名词“本、莧、头”,表示树的名词“木、丛”等都不同程度地发展成形状量词。树、树枝、树根这种一致性的变化,符合“平行虚化规律”,它们从名词语法化为量词的过程是平行对称的。这些植物部件内部保持一致的平行对称性。从植物部件发展成为植物量词再发展成为形状量词符合人类认知的一般规律,是很自然的事情。

综观汉语称量植物的量词发现,汉语有些方言有专用的植物量词,如北方方言的“棵”,南方方言的“莧”,吴语的“株”,粤语、晋语的“木”;而有些方言没有专门的植物量词,如闽语的“丛、茎”,吴语的“枝”,客、赣语的“条”,客赣语的“头”等,这些量词都已演变成形状量词,“头”还是动物量词。西南官话的“窝”,赣语的“窠”不仅是植物量词,而且是动物量词。还有些方言专用植物量词已开始向形状量词演变,如贵阳话的“棵”、粤语的“莧”等。因此,汉语方言称量植物的量词和称量“人”和“动物”的量词一样,都没有严格地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汉语称量植物的量词大多都与形状量词有密切联系,是形状量词的重要来源,这一特点具有类型学共性。

结语

Aikhenvald 对量词类型学研究显示,大多数数分类词系统区别“人、非人”“有生、无生”或者

①黎俊坚:《陆川客家话的量词》,《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②王颐:《定南方言》,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4页。

③刘泽民:《江西瑞金方言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④陈燕:《西昌方言的特殊量词及量词的特殊表达方式》,《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⑤陈家春,李进:《自贡话量词研究》,《自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⑥邵宜:《广东西江流域粤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载詹伯慧编:《第八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422页。

⑦Adams K. L., N. F. Conklin. *Toward a theory of natural classification*.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73, p.5.

⑧Croft, W.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1994, 45(2):151.

区别“人、非人的有生物、无生物”^①,如 Jacalteco 语(美洲玛雅语)有三个数分类词:人、动物、无生物^②。有些语言用一个特殊的量词称量人,一个称量动物,还有一些称量无生物,如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巴厘语(Conklin, 1981^③; Marnita, 1996^④)。Croft 也指出,在大多数数分类词系统中区别“人、非人”或“有生、无生”,但有三种特殊的情况,其中之一是有生物或人没有任何特别的量词,名词是根据事物的物理属性和功能来分类的。如 Kana 语有 19 个数分类词,它们优先按照事物的形状分类,多数有生名词都是用通用量词称量,还有些名词不用任何量词,它们根本没有“有生”的区别^⑤。

通过对汉语方言称量“人”“动物”和“植物”等有生量词使用情况的考察发现,汉语方言量词系统不像其他语言的数分类词系统,没有将“人/非人、有生/无生、人/动物/无生”等特征区别开来,汉语方言称量“人”和“动物”主要采用通用量词和形状量词,虽然有一些专用的量人量词和动物量词,但其使用的限制多、范围窄,不具有普遍性。汉语方言称量“植物”的量词却具有类型学共性,大多来源于植物或植物部件,并且可以演变成形状量词。可见,汉语方言称量有生物的量词系统不符合量词类型学的一般规律,与类型学研究中的特殊情况也有所不同,应该属于另一种特殊的量词系统。

On the Dialect Distribution of Animate Classifiers and Typological Features

WU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the classifiers that measure animate things in dialects, we find that unlike other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s,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 does not strictly distinguish “human/non-human”, “animate/inanimate” or “human/animal/inanimate”. Chinese usually adopts universal classifiers and shape classifiers to measure “human” and “animal”, although there are a few classifiers for specially measuring human and animals, its usage range is limited. The classifiers of measuring “plant” have the commonness of typology. They are all derived from plants or plant parts, and can evolve into shape classifiers. The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 of measuring living things should belong to a special type of classifier system.

Key words: animate classifiers; dialect distribution; typological features

(责任校对 龙四清)

①Aikhenvald Alexandra Y. *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93.

②Craig, Colette G.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Categorization and Noun Classification*, Eugene, Oregon, October 1983.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86, p.265.

③Conklin, N. F.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in Numeral Classification in Tai and Austronesia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p. 240.

④Marnita, R. *Classifiers in Minangkabau*. MA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6, p.135.

⑤Croft, W.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1994, 45(2):1-45-171.